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的实证分析

赵晓航 李建新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数据,本文从社会结构视角研究了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包括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以及贫富差距感知对干部信任水平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社会阶层来看,中产阶层内部各群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存在着分化趋势,而体制差异是引发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分化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并不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2)随着贫富差距感知的加剧,人们的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相应降低;(3)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可以调节贫富差距感知对干部信任水平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边缘中产阶层和高学历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的降幅更大、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的降幅更大。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中产阶层;贫富差距;政治信任;政府绩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目前,我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社会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非凡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日益凸显(Storesletten & Zilibotti, 2014)。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社会不平等的核心特征是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Yates, 2012)。近30年来,我国公众的收入不平等整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0.30左右上升至近年来的0.45以上(World Bank, 2013)。据2012年度“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 2012)资料估计,2012年全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低端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尚不足所有家庭总收入的1%,而顶端5%的家庭的收入占了所有家庭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谢宇等, 2013);同时,我国财产不平等的严重程度更甚于收入不平等——我国的家庭财产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45上升至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低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Xie & Jin, 2015)。CFPS 2012的调查结果还显示,贫富差距被我国公众视为最严重的民生问题(谢宇等, 2013)。201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资料显示,在

作者简介:赵晓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人口健康;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政策、老龄健康、社会不平等。

全国居民中有31%的人认为贫富分化问题是当前第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迫切程度高于其他民生问题。这些证据从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揭示了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和应对该问题的紧迫性。

作为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平等”的社会状态历来为多数社会成员所推崇。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平等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形式到实质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是国家权力保障下的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即侧重于形式平等;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则强调社会成员的资源享有平等,即侧重于实质平等(许庆雄,2002)。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必然存在,而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不平等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激励机制,极端平均主义所诱发的效率低下反而不利于扩大社会成员的福祉(Davis & Moore, 1945)。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的存在是否具备正当性(皮凯蒂,2014)。但是,如果单从客观层面测量贫富差距的实然状态,我们始终无法得知,究竟何种程度的贫富差距才是“正当”的或“适度”的,贫富差距的应然状态需要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需要通过公众的态度得以体现(Wu, 2009)。况且,和实际的收入分配状态相比,人们认识到的收入分配状态往往存在偏差(Malahy et al., 2009)。一些学者认为,能够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深刻影响的,不只是贫富差距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公众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认知情况和容忍程度(怀默霆,2009;谢宇,2010;李骏、吴晓刚,2012;Xie et al., 2012)。

在社会转型期,各社会群体的利益损益日渐明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社会政治态度也势必存在差异。鉴于我国自转型期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公众对贫富差距问题高度关注,以及贫富差距感知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本文涉及的社会政治态度包括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我们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第一,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特别是社会中产阶级是否扮演了“社会稳定器”的角色?第二,贫富差距感知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政府和干部的态度?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在贫富差距感知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

以往研究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我国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贫富差距感知、政府评价)之间的关系时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怀默霆,2009;李春玲,2011;张翼,2008;Whyte & Im, 2014)。怀默霆(Martin K. Whyte)的系列研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贫富差距感知之间的关系(怀默霆,2009;Whyte & Im, 2014)。无论是利用CNSID(China National Survey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项目2004年数据还是2009年数据,其研究都未发现收入对于人们的贫富差距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但是,在分别针对两期数据的考察中,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对贫富差距有害性、不公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却存在差异,利用2004年数据得出的结果表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认为贫富差距是有害的和不公的,但通过分析2009年数据并未发现受教育程度对贫富差距有害性、不公性认识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其他数据进一步厘清受教育程度与贫富差距感知之间的联系。同时,怀默霆(2009)还分析了职业类型与贫富差距感知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农民虽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但农民的贫富差距感知却并不强烈,并借助弱势群体的“不知不觉”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火山”为什么没有爆发。尽管这种社会弱势群体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反而更低的现

象与一些西方国家有着显著差别(Saunders & Wong, 2013),不过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农民的社会价值观与城市居民有着显著差别(Im, 2014),出现这样的结果似乎也在意料之中。怀默霆虽然比较了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差异,却忽略了可视为中产阶层的各职业群体之间的态度比较,因此无法确切地展现我国公众贫富差距感知的全貌。

张翼(2008)和李春玲(2011)主要关注了阶层与社会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他们明确划分了我国公众的社会阶层,其研究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部分社会政治态度有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例如,张翼(2008)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条件下,新中产阶级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最低;李春玲(2011)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新中产阶层的权威认同度最低。其中,张翼(2008)以赖特(Wright, 1979)的阶层分类框架为准,而李春玲(2011)以EGP阶层分类框架(Erikson et al., 1979; 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28—39)为准——前者代表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阶层理论,倾向于从生产关系或统治关系的角度来界定阶层;后者代表了新韦伯主义的阶层理论,倾向于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定义阶层(刘欣, 2007)。两项研究都依据职业类型划分出了相对一致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企业主阶层和老中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有所不同的是,张翼(2008)将除上述阶层以外的其他人员界定为“新中产阶级”,而李春玲(2011)的划分则更为细致,她将除上述阶层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界定为“新中产阶级”,作为中产阶层的主体与核心,将低层白领归为“边缘中产阶级”,并将他们视为工人阶层与中产阶级主体之间的过渡阶层。刘欣(2007)指出,以西方阶层理论为依据的阶层分类框架虽然对认识我国的社会阶层具有启发意义,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经济成分的主体地位及经营模式,使得我们无法简单地将中国现实的劳动关系归结为雇佣关系。因此,将“体制分割”因素引入社会阶层的分类框架是十分必要的。李路路和李升(2007)将供职于国有部门的中产阶级称为“内源中产阶级”,即更多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产阶级;而将供职于非国有部门的中产阶级称为“外生中产阶级”,即在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产阶级。但遗憾的是,多数透过社会阶层视角分析社会政治态度的研究都未能把体制因素引入阶层分类框架中,故有必要就此做出改进。

此外,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通常会受到其生活环境的影响(高勇, 2014; 孟天广、杨明, 2012; 游宇、张光, 2014; Wu & Xie, 2014),但以往诸多有关社会政治态度的研究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地区间社会环境差异,而仅仅聚焦于微观因素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怀默霆, 2009; 李春玲, 2011; 孙明, 2015; 张翼, 2008; Whyte & Im, 2014)。由于没有排除地区因素(如地区经济水平)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政治态度之间关系的影响,因此模型的估计结果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

(二)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器”

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流的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达到一定规模时,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便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简而言之,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李路路、李升, 2007)。

长期以来,社会中间层能否成为“社会稳定器”也是中国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李强(2001)认为,基于政治、思想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周晓虹(2002)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几个主要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都与国家保持紧密联系,而且是政府改革开放

政策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抗争活动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Cai, 2005; Shi, 2014; Wang et al., 2013)。对于中产阶级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稳定器”,部分学者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张翼(2009: 234)认为,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如果中产阶级在社会政治态度方面比其他阶层更倾向于保守主义,那么它就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如果相反,中产阶级持有比其他阶层更激进的社会政治态度,那么它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潜在制造者。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中产阶级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其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张翼, 2008)。李春玲(2010)通过分析中国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发现,与工人阶层相比,中产阶级在某些态度上显示出更强的保守主义倾向,而在某些态度上又显示出更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因此很难直接判断中产阶级到底是社会稳定器,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笔者认为,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是不容忽视的,基于这种内部差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很可能出现分化;同时,由于人们对不同公共议题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中产阶级在某些态度上表现得相对保守,而在另一些态度上又表现得相对自由化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分析中产阶级内部各群体间的社会政治态度差异要比分析中产阶级与其他阶层间的社会政治态度差异更具现实意义。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产阶级内部各群体在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等社会政治态度上存在差异。

(三) 贫富差距感知与政府评价

学界通常认为,社会贫富分化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公共服务水平乃至施政理念都有着紧密的联系(Bjørnskov, 2008)。一些政治学家和公共经济学家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弱势群体认为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时,他们就有可能迁怒于政府,甚至给政府制造“麻烦”,影响政局稳定(Alesina & Perotti, 1996; Lichbach, 1989)。公众如何认识社会分配状态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治信任和对政府的评价:魏格纳(Wegener, 2000)认为,对分配公平的认知直接决定公众对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拉德和李普赛特(Ladd & Lipset, 1980)提出,对分配公平的主观认识直接关系到对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认可;兹莫里和卡斯蒂洛(Zmerli & Castillo, 2015)针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指出,当人们越认为社会收入分配状态不合理,则越倾向于持较低的政治信任感。虽然国内实证研究对此鲜有探讨,但类似的情况在我国也很有可能存在,我国的一些特定因素甚至强化了公众将贫富差距与政府责任相联系的可能:首先,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领导干部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拥有相当重要的权力,当权力寻租发生必然引发资源分配的不公。其次,结构性因素是造成我国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Xie & Jin, 2015; Xie & Zhou, 2014),而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存续同我国长期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如户籍制度(Wu & Treiman, 2004)、单位制度(Wang & Xie, 2015; Zhao & Ge, 2014),等等。在现阶段,公众的“仇官”情绪往往与“仇富”情绪相伴而生,这正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带给中国的现实挑战(王天夫、王丰, 2013)。不难推测,人们感知的贫富差距趋于严重,对官员和政府的失望情绪就可能相应加重,因而持更低的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1:人们感知的贫富差距越严重,对干部的信任水平越低。

假设 2.2:人们感知的贫富差距越严重,越不可能积极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效。

如前文所述,中产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李春玲(2011)认为,作为处于工人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一个群体,边缘中产阶层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与新中产阶层较为类似,比如,他们像新中产阶层一样从事白领职业和非体力劳动,但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就业状态又可能与工人阶层较为相似,许多低层白领(包括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并不比一般的蓝领工人高,有些甚至与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相似,这样的生活状态很可能促使其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敏感、激进的特征。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1: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边缘中产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的降幅更大。

假设 3.2: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边缘中产阶层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的降幅更大。

同时,“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理论认为,文化水平较高的精英群体往往倾向于根据负面社会现实而对政府表现出更多的不满和更高的期许(Norris, 1999),而“批判性公民”趋势在我国已初露端倪(Wang, 2005; Wang & You, 2016)。因此,随着贫富差距感知的加剧,边缘中产阶层和高学历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可能会受到更强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1: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高学历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的降幅更大。

假设 4.2: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高学历群体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的降幅更大。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2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CFPS的调查对象为除港澳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以外的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全国95%的人口,因此可以将CFPS数据视为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谢宇等,2013)。CFPS的抽样采用了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式,以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要分层变量。调查中代表全国样本的16岁及以上受访对象的数据约有23 000条,其中正在从事工作的16岁至60岁的受访对象约10 800个,由于部分在业样本缺乏具体的职业描述,故在剔除无确切职业信息的样本后,最终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8 226人。

(二)变量操作化

1. 因变量

贫富差距感知:调查问及“您认为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受访者的回答包括0到10共11个等级,数值越大表示感知的贫富差距越严重。在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该变量作为自变量。

干部信任水平:调查问及“您对当地干部(当地政府的官员)的信任程度如何”,受访者的回答包括0到10共11个等级,数值越大表示对干部的信任水平越高。

政府绩效评价:调查问及“您对去年本县/市/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评价如何”,回答包含5种评价,依次为“比以前更糟了”、“没有成绩”、“没有多大成绩”、“有一定成绩”和“有很大成绩”。我们将回答“有一定成绩”和“有很大成绩”的情况视为积极评价,赋值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

2. 自变量

社会阶层:本文参考了“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East Asian Middle Class Project)设计的阶层分类框架,该项目研究者以EGP阶层分类框架为蓝本,设计了一个包含6类阶层的分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东亚中产阶层的比较研究(Hisao, 1999: 9),如表1所示:

表1 EGP阶层分类与EAMC项目阶层分类的对应关系

EGP 阶层分类		EAMC 项目阶层分类
I.	较高等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下属多于10人)	企业主阶层(雇用20人以上)
II.	较低等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下属1~10人)	新中产阶级(包括II和部分I)
IVa.	雇用他人的小雇主(雇用1~10人)	老中产阶级
IVb.	自雇者	
IIIa.	普通办公人员	边缘中产阶级
IIIb.	非体力的商业服务人员	
V.	工头	工人阶层
VI.	技术工人	
VIIa.	半技术或非技术工人	
IVc.	农民或农场主	农民阶层
VIIIb.	农业工人	

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就业部门体制属性(国有/非国有部门)信息,将社会阶层划分为9类,即企业主阶层、国有部门新中产阶级、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级、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级、国有部门工人阶层、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在变量操作化过程中,笔者将CFPS 2012数据中提供的国家标准职业分类码(GB/T6565-2009)匹配为国际码ISCO-88,再将ISCO-88匹配为EGP社会阶层分类,之后将EGP阶层分类对应转换为EAMC项目阶层分类,并加入就业部门体制属性信息,最终生成上述9类社会阶层。

收入水平:即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

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区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职高、技校)和大专及以上等几类。

3. 控制变量

主观境遇:包括主观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和感知的不公遭遇三个方面。主观社会地位指的是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哪个社会等级,共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最低级记为1,最高级记为5;生活满意度指的是受访者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共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最不满意的记为1,最满意的记为5;感知的不公遭遇是指受访者是否有过“因贫富差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户籍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性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受到政府干部的不公正对待”、“与政府干部发生过冲突”、“到政府办事时受不合理的拖延、推诿”和“到政府办事时遭到不合理的收费”等经历,有过以上经历的记为1,否则记为0,“感知的不公遭遇”为各项计分的总和。

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变量。

下页表2展示了分析对象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统计方法

表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比例(%)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感知的贫富差距	6.86	2.53	0	10
对干部的信任水平	4.85	2.46	0	10
积极评价政府工作	56.11			
社会阶层				
农民阶层	47.28			
企业主阶层	1.76			
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4.27			
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4.91			
老中产阶层	9.97			
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2.02			
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6.52			
国有部门工人阶层	4.28			
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	19.00			
收入水平	9.02	1.04	5.61	13.33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24.25			
小学	22.73			
初中	30.60			
高中	13.63			
大专及以上	8.79			
主观社会地位	2.66	0.98	1	5
生活满意度	3.26	1.03	1	5
感知的不公遭遇	0.55	1.13	0	7
男性	54.45			
年龄	41.76	10.88	16	60
中共党员	6.75			

根据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情况,在因变量为贫富差距感知和干部信任水平时构建 OLS 模型,因变量为政府绩效评价时主要采用 Logit 模型。下文包含社会阶层与贫富差距感知的交互效应、受教育程度与贫富差距感知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由于 Logit 模型存在未被观测的异质性(残差变异)问题,即使群体间的残差方差只存在较小差异,直接用交互项来比较群体间系数差异仍会带来很大偏差,有可能显示出根本不存在的差异,或掩盖真实的差异,甚至与真实差异相反(Hoetker, 2007),此时可以构建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即以二分变量为因变量的 OLS 回归模型,以确保获得可靠的统计结果(Mood, 2010; 洪岩璧, 2014)。因此,当检验社会阶层与不平等感知的交互效应时,本文在采用 Logit 模型的同时采用了线性概率模型对结果进行检验。其次,已有研究通过分析 CFPS 2012 数据发现,区县的社会经济状况会影响人们的贫富差距感知和干部信任水平(Wu & Xie, 2014),为了尽可能控制各区县的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避免宏观层面的变量对研究的干扰,本文控制了区县固定效应,以消除地区之间的忽略变量的影响(谢宇, 2013: 155)。再次,由于分析对象的一些变量存在缺失值,若直接将信息完整的分析对象纳入多元回归模

型就会出现样本量缩减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很难确保这些信息是完全随机缺失的。为此,我们在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时,通过现阶段处理缺失值的标准方法——多重填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填补了变量缺失值,从而有效降低了由数据非随机缺失所引起的估计偏差(唐启明,2012: 171)。具体而言,我们以链式方程(chained equation)填充的方式建立5个拓展数据集,然后按照鲁宾合并法则(Rubin's combination rules)计算出新的回归系数和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

(一)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

下页表3汇报了各因素对人们的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从“贫富差距感知”模型(模型1)可以看出:从社会阶层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较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农民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显著更小,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显著更大,其他中产阶层群体、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同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同时,中产阶层各群体的贫富差距感知存在差异,通过在模型1中重设参照组可以发现,老中产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显著低于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p < 0.01$)。从收入水平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收入水平对贫富差距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即使不控制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对贫富差距感知也依然没有显著影响,若在模型中加入收入水平的平方项,收入水平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不显著异于0。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同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人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人群所感知的贫富差距显著更严重,且呈现出递增趋势。

“干部信任水平”模型(模型2)显示:从社会阶层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较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显著更高,而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显著更低。无论是否控制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干部信任水平的影响均不显著。人们感知的贫富差距越严重,对干部的信任水平就越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性格乐观的人往往会积极地看待各类社会议题,因此存在乐观者的贫富差距感知较弱、干部信任水平较高的情况,但这两种社会政治态度之间并没有实质关联的可能性,即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不过,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主观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和感知的不公遭遇等主观境遇因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由人格特质引发的选择性偏差。同时,中产阶层各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存在差异,通过在模型2中重设参照组可以发现,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p < 0.01$)和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p < 0.05$),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体制性差异。

“政府绩效评价”模型(模型3)显示:从社会阶层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较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显著地更加积极,企业主阶层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更加积极。无论是否控制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对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都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和政府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从中可见,相较于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人群,初中、高中学历人群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显著更高,但小学、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较之无显著差异。同时,人们感知的贫富差距越严重,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就越低。此外,中产阶层各群体的政府绩效评价存在差异,通过在模型3中重设参照组可以发现,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显著高于老中产阶层($p < 0.01$)、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p < 0.05$)和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p < 0.05$)。综上所述,中产阶层的部分群体之间在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假设1获得了

支持;同时,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加剧,人们对干部的信任水平更低,更不可能积极评价政府工作,因此假设 2.1 和假设 2.2 获得了支持。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贫富差距感知影响的调节作用

表 4 汇报了感知的贫富差距与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对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各模型中“感知的贫富差距”经过了“对中”(mean centering)处理,即以该变量的原值减去其样本均值,这既是为了削弱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也是为了便于理解交互项的原组成项的回归系数(杰卡德、图里西,2012: 28-45)。

表 3 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因素(N=8226)

	贫富差距感知 模型 1(OLS)	干部信任水平 模型 2(OLS)	政府绩效评价 模型 3(Logit)
社会阶层(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0)			
农民阶层	-0.323*** (0.092)	0.340*** (0.087)	-0.018 (0.082)
企业主阶层	-0.183 (0.573)	0.629 (0.504)	0.799 ^a (0.401)
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0.150 (0.153)	0.226 (0.149)	0.434** (0.152)
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0.097 (0.139)	-0.259* (0.131)	0.180 (0.132)
老中产阶层	-0.072 (0.108)	0.036 (0.102)	-0.015 (0.096)
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0.127 (0.190)	0.260 (0.185)	-0.058 (0.186)
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0.284* (0.119)	-0.147 (0.119)	0.088 (0.111)
国有部门工人阶层	0.146 (0.154)	0.003 (0.143)	0.026 (0.138)
收入水平	-0.019 (0.031)	0.008 (0.030)	-0.016 (0.029)
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			
小学	0.154 (0.092)	-0.112 (0.083)	-0.026 (0.080)
初中	0.319*** (0.089)	-0.039 (0.083)	0.256** (0.075)
高中	0.467*** (0.111)	-0.054 (0.103)	0.309** (0.099)
大专及以上	0.810*** (0.144)	-0.010 (0.138)	0.105 (0.136)
主观社会地位	-0.028 (0.034)	0.208*** (0.031)	0.038 (0.027)
生活满意度	-0.167*** (0.031)	0.233*** (0.031)	0.081** (0.026)
感知的不公遭遇	0.330*** (0.024)	-0.351*** (0.025)	-0.184*** (0.024)
男性	0.114* (0.058)	0.125* (0.055)	0.182** (0.055)
年龄	0.000 (0.003)	0.013*** (0.003)	0.010*** (0.003)

(续表3)

中共党员	-0.103 (0.112)	0.349*** (0.105)	0.557*** (0.113)
感知的贫富差距		-0.083*** (0.012)	-0.093*** (0.011)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项	7.069*** (0.559)	3.968*** (0.456)	0.946 (0.511)
R²/ Pseudo R²	0.105	0.155	0.096

注:(1)*p<0.05,**p<0.01,***p<0.001;(2)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表4 贫富差距感知与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分析(N=8226)

	干部信任水平		政府绩效评价	
	模型4 (OLS)	模型5a (Logit)	模型5b (OLS)	
感知的贫富差距	-0.104*** (0.025)	-0.087*** (0.023)	-0.019*** (0.005)	
社会阶层(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0)				
农民阶层	0.349*** (0.087)	-0.014 (0.082)	-0.002 (0.018)	
企业主阶层	0.635 (0.530)	0.823 (0.409)	0.169 (0.075)	
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0.193 (0.154)	0.462** (0.161)	0.088** (0.031)	
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0.212 (0.135)	0.221 (0.138)	0.044 (0.029)	
老中产阶层	0.033 (0.102)	-0.015 (0.096)	-0.003 (0.021)	
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0.396* (0.183)	0.016 (0.199)	-0.001 (0.041)	
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0.145 (0.123)	0.158 (0.119)	0.032 (0.025)	
国有部门工人阶层	0.017 (0.145)	0.039 (0.143)	0.007 (0.030)	
交互项				
感知的贫富差距×农民阶层	0.046 (0.030)	0.000 (0.027)	0.000 (0.006)	
感知的贫富差距×企业主阶层	0.012 (0.127)	0.017 (0.105)	0.008 (0.017)	
感知的贫富差距×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0.048 (0.062)	-0.050 (0.063)	-0.005 (0.011)	
感知的贫富差距×非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	-0.082 (0.061)	-0.069 (0.054)	-0.014 (0.011)	
感知的贫富差距×老中产阶层	0.027 (0.044)	0.066 (0.038)	0.014 (0.008)	
感知的贫富差距×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0.254** (0.082)	-0.129 (0.091)	-0.027 (0.018)	
感知的贫富差距×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	0.008 (0.057)	-0.133* (0.052)	-0.027** (0.010)	
感知的贫富差距×国有部门工人阶层	-0.024 (0.060)	-0.034 (0.055)	-0.006 (0.011)	
R²/ Pseudo R²	0.157	0.098		

注:(1)控制了表3全体变量,受篇幅所限未展示;(2)*p<0.05,**p<0.01,***p<0.001;(3)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由模型4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每提升一个单位,则其干部信任水平平均降低0.104个单位;当各个社会阶层所感知的贫富差距处于整体的平均水平时,相较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平均显著高出0.349个单位,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平均显著高出0.396个单位;由交互项可知,就干部信任水平所受影响而言,感知的贫富差距对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对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的影响,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每提升一个单位,则其干部信任水平平均降低0.358(=0.104+0.254)个单位。图1模拟了在特定条件下——模型4中连续变量取均值,名义变量取参照组——估计出的贫富差距感知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干部信任水平的影响效果。从中可见,在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较低时,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对干部的信任度高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而当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处于较高水平时,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对干部的信任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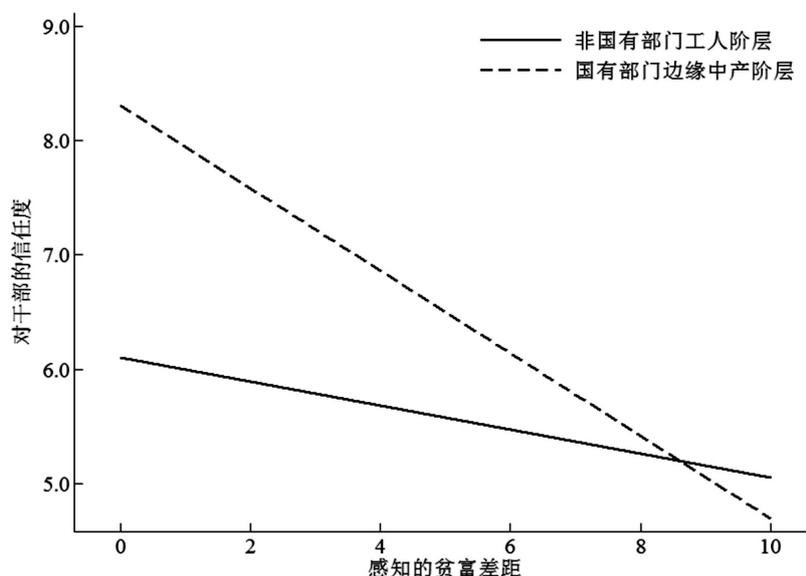


图1 感知的贫富差距对不同社会阶层干部信任水平的影响

由模型5a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每提升一个单位,则其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发生比(odds)平均降低8.3%(=1-e^{-0.087});当各个社会阶层所感知的贫富差距处于整体的平均水平时,相较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国有部门新中产阶层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发生比平均显著高出58.7%(=e^{0.462}-1),企业主阶层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出1.27倍(=e^{0.823}-1);由交互项可知,就政府绩效评价所受影响而言,感知的贫富差距对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对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的影响,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感知的贫富差距每提升一个单位,则其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发生比平均降低19.7%(=1-e^{-0.087-0.133})。不过,以上交互项检验并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情况,而是假定不同社会阶层具有相同的残差方差。为了克服Logit模型所固有的残差变异问题,模型5b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对模型5a的结果进行检验,其统计规律同模型5a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感知的贫富差距对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的负面影响强于对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的影响。下页图2模拟了以特定条件估计出的贫富差距感知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效果。在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较低时,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高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而当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较高时,非国

有部门边缘中产阶层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低于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综上所述,假设3.1和假设3.2获得了支持。

表5汇报了感知的贫富差距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效应对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其中“感知的贫富差距”是对中值。由模型6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感知的贫富差距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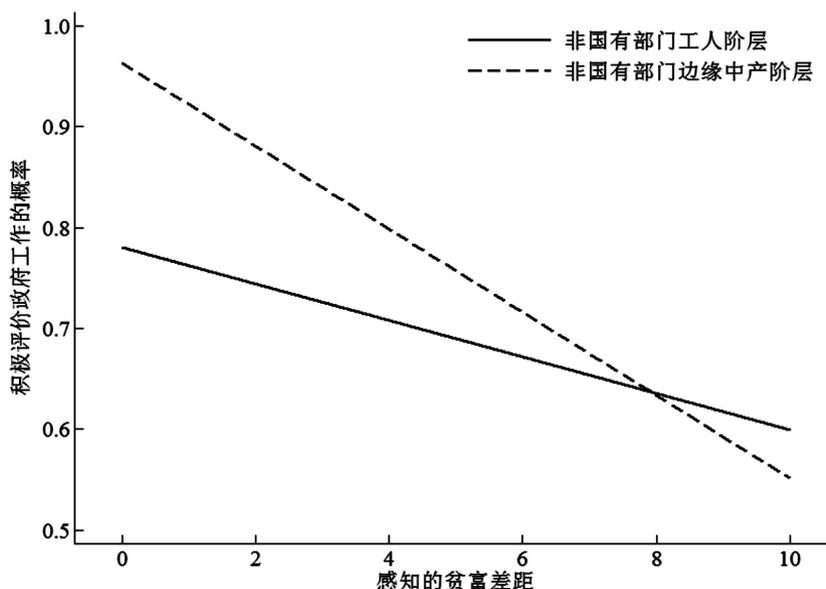


图2 感知的贫富差距对不同社会阶层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

表5 贫富差距感知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效应分析 (N=8226)

	干部信任水平		政府绩效评价	
	模型6 (OLS)	模型7a (Logit)	模型7b (OLS)	
感知的贫富差距	-0.044 (0.024)	-0.060** (0.021)	-0.013** (0.004)	
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				
小学	-0.132 (0.084)	-0.037 (0.081)	-0.009 (0.018)	
初中	-0.062 (0.083)	0.242** (0.075)	0.051** (0.016)	
高中	-0.066 (0.104)	0.303** (0.101)	0.064** (0.021)	
大专及以上	0.039 (0.142)	0.154 (0.145)	0.032 (0.030)	
交互项				
感知的贫富差距×小学	-0.030 (0.034)	-0.008 (0.029)	-0.002 (0.006)	
感知的贫富差距×初中	-0.052 (0.032)	-0.062* (0.029)	-0.012 (0.006)	
感知的贫富差距×高中	-0.076 (0.040)	-0.066 (0.036)	-0.012 (0.008)	
感知的贫富差距×大专及以上	-0.136** (0.047)	-0.121* (0.052)	-0.023* (0.010)	
R²/ Pseudo R²	0.156	0.097		

注:(1)控制了表3全体变量,受篇幅所限未展示;(2)*p<0.05,**p<0.01,***p<0.001;(3)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的干部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对文盲、半文盲群体的影响。图3模拟了该趋势的演变情况。模型7a和模型7b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感知的贫富差距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政府绩效评价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对文盲、半文盲群体的影响。图4模拟了该趋势的演变情况。下页表6中各模型将受教育程度简化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两类。由模型8可知,贫富差距感知对高等教育群体干部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更大。由模型9a和模型9b可知,贫富差距感知对高等教育群体政府绩效评价的负面影响更大。综上,假设4.1和假设4.2获得了支持。此外,我们没有发现贫富差距感知与收入水平的交互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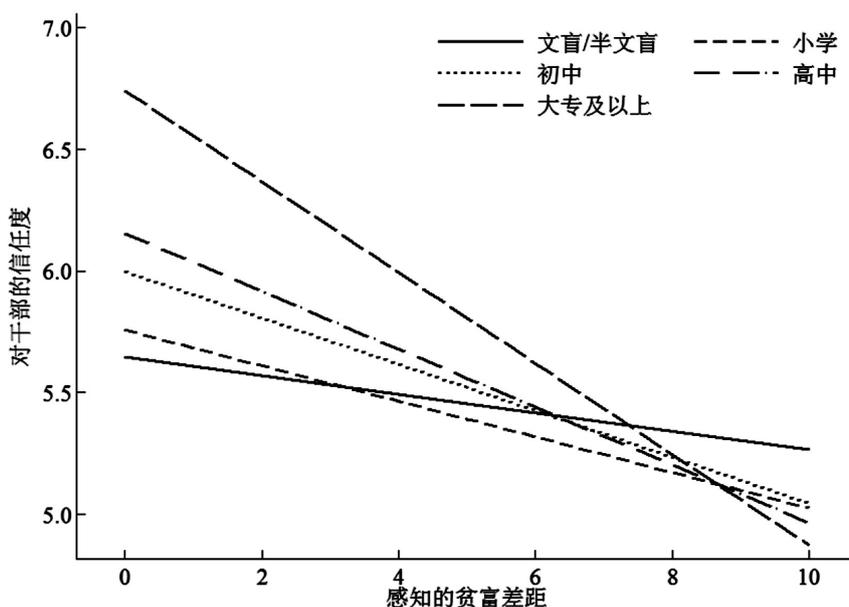


图3 感知的贫富差距对不同学历群体干部信任水平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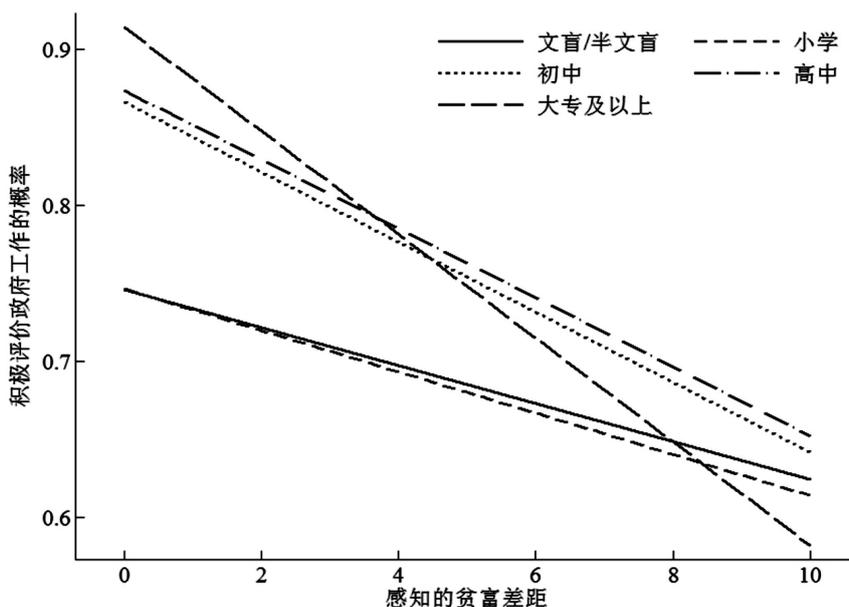


图4 感知的贫富差距对不同学历群体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

表6 贫富差距感知与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交互效应分析(N=8226)

	干部信任水平		政府绩效评价	
	模型8 (OLS)	模型9a (Logit)	模型9b (OLS)	
感知的贫富差距	-0.078*** (0.012)	-0.086*** (0.011)	-0.019*** (0.002)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0)				
大专及以上	0.123 (0.112)	-0.073 (0.124)	-0.017 (0.025)	
交互项				
感知的贫富差距×大专及以上	-0.101* (0.042)	-0.096* (0.048)	-0.018* (0.009)	
R ² / Pseudo R ²	0.155	0.094		

注:(1)控制了表3除受教育程度以外的其他变量,受篇幅所限未展示;(2)*p<0.05,**p<0.01,***p<0.001;(3)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现阶段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贫富分化加剧的严峻挑战,公众如何认识现实存在的社会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感知又能否成为公众迁怒于国家的潜在风险,这些方面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人们的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多重因素。本文将以往多数研究未考虑的体制因素引入了阶层划分的条件之中,从而更好地展现了目前我国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同时,本文研究了人们感知的贫富差距同干部信任水平、政府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社会结构因素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鲜有提及。通过定量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从社会阶层来看,中产阶级内部各群体在贫富差距感知、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等方面存在着分化趋势。其中,体制差异是引发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分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国有部门新中产阶级和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级对干部的信任水平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因“体制内”身份而更少遭受制度性歧视和干部的不公正对待;国有部门新中产阶级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更高,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属于体制内优势阶层,从而对国家权威抱有高度认同。仅从本文分析的三类社会政治态度来看,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相较于工人阶层,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群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并未表现得更加积极,例如,非国有部门边缘中产阶级甚至比非国有部门工人阶层感受到更严重的贫富差距。其次,随着贫富差距感知的加剧,人们的干部信任水平和政府绩效评价相应降低。这在一定意义上暗示了公众的贫富差距感知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最后,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可调节贫富差距感知对干部信任水平与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随着感知的贫富差距严重性的加剧,边缘中产阶级、高学历群体的干部信任水平的降幅更大、积极评价政府工作的可能性的降幅更大。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边缘中产阶级、高学历群体更强调政府和官员责任,更有可能将不平等归咎于制度因素。

当然本文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比如针对各类社会政治态度的测量只采用了单一题项,因此测量效度和信度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内生性问题未被完全排除,因此并没有严

格地验证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高勇,2014,《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洪岩璧,2014,《Logistic模型的系数比较问题及解决策略:一个综述》,《社会》第4期。
- 怀默霆,2009,《中国公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李春玲,2011,《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第2期。
- 李骏、吴晓刚,2012,《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李路路、李升,2007,《“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强,2001,《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刘欣,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孟天广、杨明,2012,《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 孙明,2015,《城市中产阶层的改革态度:利益驱动与理念牵引》,《江海学刊》第5期。
- 唐启明,2012,《量化数据分析:通过社会研究检验想》,任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托马斯·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王天夫、王丰,2013,《不平等挑战中国》,宋晓梧等编《不平等挑战中国——收入分配的思考与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谢宇,2010,《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第3期。
- ,2013,《回归分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谢宇、张晓波、李建新、涂平、任强,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许庆雄,2002,《现代人权体系中平等原则之研究(上)》,《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6期。
- 游宇、张光,2014,《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开放时代》第1期。
- 詹姆斯·杰卡德、罗伯特·图里西,2012,《多元回归中的交互作用》,蒋勤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翼,2008,《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2009,《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李春玲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晓虹,2002,《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Alesina, Alberto and Roberto Perotti. 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81 (5): 1170-1189.
- Bjørnskov, Christian. 2008. "The Growth-Inequality Association: Government Ideology Matt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7: 300-308.
- Cai, Yongshun. 2005.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45 (5): 777-799.
- Davis, Kingsley and Wilbur E. Moore.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 242-249.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ucienne Portoca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415-451.
- Hoetker, Glenn. 2007. "The Use of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331-343.
-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1999.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Im, Dong Kyun. 2014. "The Legitimation of Inequality Psychosocial Dispositions, Educ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Income Inequality"

ty in Chin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7 (4): 506–525.

Ladd, Everett Carll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80.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 Trends and the Likely Climate for the 1980s.” In Peter Duignan and Alvin Rabushka (e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72–74.

Lichbach, Mark Irving. 1989. “An Evaluation of ‘Does Economic Inequality Breed Political Conflict?’ Studies.” *World Politics* 41 (4): 431–470.

Malahy, Lori W., Michelle A. Rubinlicht, and Cheryl R. Kaiser. 2009. “Justifying Inequality: A Cross–Temporal Investigation of U. S. Income Disparities and Just–World Beliefs from 1973 to 2006.”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2: 369–383.

Mood, Carina. 2010. “Logistic Regression: Why We Cannot Do What We Think We Can Do,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67–82.

Norris, Pippa. 1999.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in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7.

Saunders, Peter and Melissa Wong. 2013. “Examining Australian Attitudes to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71: 51–75.

Shi, Fayong. 2014. “Improving Local Governance without Challenging the State: The Middle–Class Protest in Urba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 (1): 153–162.

Storesletten, Kjetil and Fabrizio Zilibotti. 2014. “China’s Great Convergence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6: 333–362.

Wang, Jia and Yu Xie. 2015. “Feeling Good about the Iron Rice Bowl: Economic Sector and Happiness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3: 203–217.

Wang, Zhengxu, Long Sun, Liuqing Xu, and Dargan Pavlicevic. 2013. “Leadership in China’s Urban Middle Class Protest: The Movement to Protect Homeowners’ Rights in Beijing.”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411–431.

Wang, Zhengxu. 2005.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1): 155–171.

Wang, Zhenxu and Yu You. 2016.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DOI: 10.1080/03906701.2015.1103054.

Wegener, Bernd. 2000.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A Social Justice Approach: Introduc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3 (2): 75–82.

Whyte, Martin King and Dong Kyun Im. 2014. “Is the Social Volcano Still Dormant? Trends i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Inequa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8 (4): 62–76.

World Bank. 2013. “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Inequality in Focus* 2 (2): 1–5.

Wright, Erik Olin.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u, Qiong and Yu Xie. 2014. “The Effects of Contextual and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on Chinese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Environment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 84–102.

Wu, Xiaogang. 2009.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200: 1033–1052.

Wu, Xiaogang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41: 363–384.

Xie, Yu and Xiang Zhou. 2014.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6928–6933.

Xie, Yu and Yongai Jin. 2015. “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 (3): 203–229.

Xie, Yu, Arland Thornton, Guangzhou Wang, and Qing Lai. 2012. “Societal Projection: Belief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 1069–1084.

Yates, Michael D. 2012. “The Great Inequality.” *Monthly Review* 60 (10): 1–18.

Zhao, Wei and Jianhua Ge. 2014. “Du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Housing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37: 23–41.

Zmerli, Sonja and Juan Carlos Castillo. 2015.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ve Fairness and Political Trust in Lat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2: 179–19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 2012 Data

ZHAO Xiao-hang LI Jian-xin

Abstract: Using CFPS 2012 data and drawing from the soc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iscussed (1)the relationship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including perceived inequality, trust in cadre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ting, and (2)the effect of perceived inequality on trust in cadre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ting. Our results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of China’s middle class are diverse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middle class, partly ow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segmentation, and there is no clue that the middle class will inevitably become the “societal stabilizer”. Secondly, perceived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rust in cadre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ting. Thirdly,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can act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between perceived inequality and attitudes toward cadres/government. With perceived inequality deteriorating, the people with tertiary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maintain their trust in cadre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rating relatively low.

Key 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Middle Class; Inequality; Political Trus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谢桂华)